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因应

——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经验数据

黄国华

(上海海事大学 文理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基于1995~2006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29个省市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理论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二者互为影响。实证分析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二者互为因果。鉴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所发挥的积极效应,应着力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鉴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既受到非农收入边际效用的影响,又受到非农收入成本率的影响,为促使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既要提高非农收入的边际效用,又要降低非农收入的成本率。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转移; 城乡收入差距; 因应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0)02-0071-07

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口众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大批农民开始向城市流动和转移,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农民进城潮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也主要在于城乡比较利益的存在。本文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的简单回顾及评价,以全国29个省市为依据^①,经过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分析,探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具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促使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若干政策启示。

一、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文献综述

(一)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文献

1. 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

(1)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1954年刘易斯首次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该模型把经济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他的分析是:经济增长最初集中在资本比较丰富的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而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工资率基本维持生存水平;由于最初工业部门就业机会有限,工资率和

劳动生产率都很高,这样城市现代化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首先迅速扩大,然后随着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入差距逐渐缩小。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基于美、英、德等国家历史数据的分析提出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即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曲线”对于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的结论与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的结论是一致的,但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经济发展而先升后降,他进一步指出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是当时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条件造成的,合理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些历史条件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谢尔曼·罗宾森对倒U曲线的合理性给予了数学证明,认为总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城市人口比重的二次函数,收入差距随着城市人口比重的上升逐渐扩大;当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0%之后,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才会出现下降。Terry Sicular(2007)认为居住区域、居民教育程度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

(2)城乡收入差距不会因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弱化,反而会通过“累积性因果循环”而加固。缪尔达尔(1957)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地理二元结构”,认为城乡的诸多差异并不是通过要素的流动而逐步弱化,相反,城乡差距会产生进而引

收稿日期: 2009-08-17

基金项目: 上海海事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S2010066)

作者简介: 黄国华(1980—),女,讲师,经济学博士。E-mail: huangguohua1017@126.com

①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考虑,剔除西藏样本,重庆并入四川,共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29个省市。

起“累积性因果循环”,导致城市区域发展更快,乡村区域发展更慢(乡村发展陷入纳克斯描述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城乡差异在逐步增大中出现“马太效应”,最终在空间组织结构上呈现为埃及发展经济学家阿明在《世界范围的积累》中所谓的“中心-外围”结构。

2. 国内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文献

国内专家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总体上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1)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郝爱民(2006)利用我国1981~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结构变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陈迅(2007)基于全国统计数据,通过城市化及其相关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多元回归分析,得出1985~2003年中国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进程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程开明(2007)根据1978~2004年的时序数据,对城市偏向、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城市化与城市偏向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对城乡差距扩大产生正向冲击。赵颖(2008)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协整因果关系作了初步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

(2)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陆铭、陈钊(2004)基于省级面板数据(Panel data),并对之进行检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周峰(2006)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考察可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基于1997~2003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许秀川(2008)以系统动力学模型和Vensim软件为分析工具,对城市化、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仿真结果表明,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董长瑞(2008)在新古典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出有中国特色的人口流动模型,并通过协整分析验证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能消除城乡差距,但对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发挥巨大效应。彭腾(2004)、史晓红(2008)从理论上也

分析劳动力转移是解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有效途径,但缺少实证研究。

(3)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进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陈家宁(2006)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短期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内缩小收入差距的结论。李静(2007)根据我国1990~2004年各省数据,估计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化短期效应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长期使其缩减,从而得出城市化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主要途径的政策启示。

(二)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文献

1. 国外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关观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国外也曾引起经济学、社会学学者的广泛关注,有关的文献也很多,比较起来明显的观点是:

城乡收入差距会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入非农部门。威廉·配第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动原因,他指出:比较利益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两元经济模型”,认为资本主义部门(工业部门)可保持不变的工资率(比农业工资高),同时用于投资的利润也越来越多,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越来越多,一直到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为止。托达罗(1969)认为迁移决策取决于潜在的迁移者对预期收入的估计,这种估计同时依赖于实际的城乡工资差异和在城市部门成功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城乡工资差距和城市就业概率构成了农村人口迁移动机的主要方面。博加斯(1987)提出了自我选择模型,认为迁移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因素:潜在迁移者可观察到或不可观察到的个人能力“可转移度”、相对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平均收入水平的比较。

2. 国内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关研究

国内专家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1)城乡收入差距诱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速城市化进程。(蔡昉、王德,2003)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动力是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导致的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而改革开放以来扩大了城乡收入

差距则为这种转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严盈芳(2006)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适当的差距促进了城乡之间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李仙娥(2006)通过定性分析,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推动的结论。杜瑞珍(2006)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由于城乡间收入差异的刺激而造成劳动者对高收入的向往和行为取向。刘小翠(2007)运用规范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估计出城乡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弹性是 0.037 7,城乡收入差距是促成劳动力流动的格兰杰成因,但反之却不成立。贺文华(2008)指出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推动因素。

(2)城乡收入差距不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王春超(2005)根据相关的调查数据做出经验检验,得出结论是:从农民转移就业的发展趋势上看,城乡收入差异并不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在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转移就业呈现出大规模集聚的趋势,这种由地区就业集聚所形成的社会、信息网络对农民外出就业的帮扶效应则显著地影响着农民的转移行为。陈文权(2008)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总劳动在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重新分配和重新配置,发生这种变化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接推动,而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动。吕蕾(2008)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并未增加,这种结果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城市经济发展不足导致城市就业容量不足;二是制度因素限制了劳动力转移。

(3)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杭雷鸣(2005)认为近几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在各个层面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阻碍作用,从内部机制来看,由收入高低所决定的城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城市“反斥力”和农村“反拉力”;从外部表现来看,制度性壁垒与市场性壁垒并存是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种表现形式,改革户籍制度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措施应同步推进。

二、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模型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沿用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城乡收入差距用泰尔指数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引起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水平用城市化率表示,来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泰尔指数和城市化率用公式表达为

$$\text{泰尔指数} = \frac{\text{农村收入}}{\text{总收入}} \ln \frac{\text{农村收入/总收入}}{\text{农村人口/总人口}} + \frac{\text{城镇收入}}{\text{总收入}} \ln \frac{\text{城镇收入/总收入}}{\text{城镇人口/总人口}}$$

$$\text{城市化率} = \frac{\text{非农人口}}{\text{非农人口} + \text{农业人口}}$$

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构建过程如下:

便于分析起见,我们只考虑两期。在第一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 x , 农业人口为 n ,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y , 城镇人口为 m , 得出

$$\text{泰尔指数 } T = \frac{xn}{xn+ym} \ln \left\{ \frac{xn/(xn+ym)}{n/(n+m)} \right\} + \frac{ym}{xn+ym} \ln \left\{ \frac{ym/(xn+ym)}{m/(n+m)} \right\}$$

$$\text{城市化指数 } u = \frac{m}{n+m}$$

到第二期,由于不考虑其它因素,所以人均收入不变,人口总数也不变,只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得 a 部分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可得出

$$T(a) = \frac{x(n-a)}{x(n-a)+y(m+a)} \ln \frac{x(n-a)/[x(n-a)+y(m+a)]}{(n-a)/(n+m)} + \frac{y(m+a)}{x(n-a)+y(m+a)} \ln \frac{y(m+a)/[x(n-a)+y(m+a)]}{(m+a)/(n+m)},$$

$$u(a) = \frac{m+a}{n+m}$$

则, $\frac{u}{1-u} = \frac{m+a}{n-a}$, 一般地有 $n > m$, 直辖市 $n < m$; 其经济学含义是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例, 与 a 具有相同的单调性, 与城市化指标具有相同的单调性。

收入差距 $p = \frac{x}{y} \leq 1$, 则

$$T(u(a), p) = \frac{p(1-u)}{p(1-u)+u} \ln \frac{p}{p(1-u)+u} + \frac{u}{p(1-u)+u} \ln \frac{1}{p(1-u)+u} = \frac{(1-u)p \ln p}{p(1-u)+u} - \ln[p(1-u)+u]$$

容易验证: 当 $p=1$ 时, $T(u, 1) \equiv 0, \forall u$, 意味着城乡之间如果不存在收入差异, 那么城乡之间不会出现人口流动, 即使出现了人口流动现象, 也不会改变城乡之间收入无差异的状态。

当 $p < 1$ 时

$$\frac{\partial T(u, p)}{\partial u} = -\frac{p \ln p}{[p(1-u)+u]^2} - \frac{1-p}{p(1-u)+u}$$

$$\text{令 } \frac{\partial T(u, p)}{\partial u} = 0$$

$$\text{得} \quad \tilde{u}(p) = -\frac{p}{1-p} - \frac{p \ln p}{(1-p)^2}$$

$$\text{有} \quad \frac{\partial T(u, p)}{\partial u} \Big|_{\tilde{u}(p)} = 0$$

当 $u < \tilde{u}$ 时, $\frac{\partial T(u, p)}{\partial u} > 0$; 当 $u > \tilde{u}$ 时, $\frac{\partial T(u, p)}{\partial u} < 0$ 。

其经济学含义是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在城市化水平较低时期,泰尔指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当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泰尔指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减少。

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引起的城市化水平的变动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二)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运用成本效用均衡分析法,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型。构建过程如下:

假定 1: 有两个农民,农民和农民,两者的效用分别表示为 U_1 和 U_2 。

假定 2: 有两种收入, 农业收入 Y_a 和非农收入 Y_i , 在农村获得农业收入, 在城镇获得非农收入。

假定 3: 农民 1 可以拥有 Y_{a1} 和 Y_{i1} 两种收入, 农民 2 可以拥有 Y_{a2} 和 Y_{i2} 两种收入, 两种收入都会带来效用, 分别表示为 $U_1(Y_{a1}Y_{i1})$ 和 $U_2(Y_{a2}Y_{i2})$ 。

假定 4: 获得农业收入的成本投入率为 λ_a , 获得非农收入的成本投入率为 λ_i , 农民 1 为获得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付出的成本为 $\lambda_{a1}Y_{a1} + \lambda_{i1}Y_{i1} = C_1$, 农民 2 为获得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付出的成本为 $\lambda_{a2}Y_{a2} + \lambda_{i2}Y_{i2} = C_2$ 。

当农民 1 和农民 2 效用之和最大时, 两种收入的分配达到最优状态, 于是可得

$$\max(U_1 + U_2) = \max[U_1(Y_{a1}Y_{i1}) + U_2(Y_{a2}Y_{i2})]$$

$$\lambda_{a1}Y_{a1} + \lambda_{i1}Y_{i1} = C_1$$

$$\lambda_{a2}Y_{a2} + \lambda_{i2}Y_{i2} = C_2$$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L = U_1(Y_{a1}Y_{i1}) + U_2(Y_{a2}Y_{i2}) - W(\lambda_{a1}Y_{a1} + \lambda_{i1}Y_{i1} - C_1) - M(\lambda_{a2}Y_{a2} + \lambda_{i2}Y_{i2} - C_2)$$

分别对 Y_{a1} Y_{a2} Y_{i1} Y_{i2} 求微分, 可得

$$\frac{\partial L}{\partial Y_{a1}} = \frac{\partial U_1}{\partial Y_{a1}} - W\lambda_{a1} = 0 \quad (1)$$

$$\frac{\partial L}{\partial Y_{a2}} = \frac{\partial U_2}{\partial Y_{a2}} - M\lambda_{a2} = 0 \quad (2)$$

$$\frac{\partial L}{\partial Y_{i1}} = \frac{\partial U_1}{\partial Y_{i1}} - W\lambda_{i1} = 0 \quad (3)$$

$$\frac{\partial L}{\partial Y_{i2}} = \frac{\partial U_2}{\partial Y_{i2}} - M\lambda_{i2} = 0 \quad (4)$$

根据式(1)式(2)可以先求出 W 和 M , 代入式(3)式(4), 整理得

$$\frac{\partial L}{\partial Y_{i1}} = \frac{\partial U_1}{\partial Y_{i1}} - (\lambda_{i1}/\lambda_{a1}) (\frac{\partial U_1}{\partial Y_{a1}} - \frac{\partial L}{\partial Y_{a1}}) = 0$$

$$\frac{\partial L}{\partial Y_{i2}} = \frac{\partial U_2}{\partial Y_{i2}} - (\lambda_{i2}/\lambda_{a2}) (\frac{\partial U_2}{\partial Y_{a2}} - \frac{\partial L}{\partial Y_{a2}}) = 0$$

$$\frac{\partial U_1}{\partial Y_{i1}} = (\lambda_{i1}/\lambda_{a1}) (\frac{\partial U_1}{\partial Y_{a1}}) \quad \frac{\partial U_2}{\partial Y_{i2}} = (\lambda_{i2}/\lambda_{a2}) (\frac{\partial U_2}{\partial Y_{a2}})$$

$$\frac{\partial U_2/\partial Y_{i2}}{\lambda_{i2}} = \frac{\partial U_1/\partial Y_{a1}}{\lambda_{a1}} \quad (5)$$

$$\frac{\partial U_2/\partial Y_{i2}}{\lambda_{i2}} = \frac{\partial U_2/\partial Y_{a2}}{\lambda_{a2}} \quad (6)$$

即

$$\frac{\text{非农收入的边际效用}}{\text{非农收入的成本率}} = \frac{\text{农业收入的边际效用}}{\text{农业收入的成本率}} \quad (7)$$

满足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就能达到最优状态。

从式(7)可见,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既受到非农收入的实际效用的影响, 又受到非农收入的成本率的影响, 城市较高收入是非农收入实际效用的一个因子, 从而城乡收入差距构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影响因素。

三、实证模型设定及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在实证模型的设定中, 本文用转移比率来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变量, 转移比率用式子可表达为:

转移比率 = (本年的农业人口 - 去年的农业人口 - 去年的农业人口 × 本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 本年的农业人口

城乡收入差距用泰尔指数来表示, 表达式见上文。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 分别找出 1995~2006 年份我国 29 个省市的城镇人口、农业人口、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口自然增长率, 根据上文的变量诠释, 分别计算出 29 个省市 1995~2006 年份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转移比率和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经济变量大都具有非平稳性, 首先对转移比率和泰尔指数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是同阶单整的, 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转移比率和泰尔指数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并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验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 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法对 29 个省市转移比率和泰尔指数变量序列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我国绝大部分省市的转移比率和泰尔指数变量序列的水平值都是非平稳的, 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是平稳的, 说明各省市的转移比率和泰尔指数变量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 即为 I(1) 过程。

据此, 对 29 个省市 1995~2006 年的转移比率和泰尔指数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 泰尔指数与转移比率协整检验的统计量为 21.003, 大于 5% 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18.398, 其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大于其临界值,即可以认为在95%的置信程度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原假设为 $r=0$),也就是表明泰尔指数与转移比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9个省市的转移比率和泰尔指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据此,论文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验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保证序列的同质性,按2006年的人均GDP(按常住人口计算),把29个省市大致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第二组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广西;第三组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格兰杰检验		滞后阶数(Lags)	F 统计量	统计值
第一组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	1	5.146	0.040
	城乡收入差距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1	8.649	0.024
第二组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	1	4.478	0.046
	城乡收入差距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1	16.349	0.006
第三组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	1	7.761	7.761
	城乡收入差距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1	6.845	0.038

由表1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 TRANSFER 在 95%的置信程度下拒绝原假设(原假设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因此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反之,城乡收入差距 TAI 在95%的置信程度下也能拒绝原假设(原假设为城乡收入差距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因此也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从上文的理论构建及实证分析可知,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解释变量,二者互为解释、互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二者互为

作用、互为因果。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从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入手;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必须从城市较高收入入手,提高较高非农收入的边际效用,降低较高非农收入的成本率。

(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为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必须培育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产业基础。

首先,要加快工业化进程。一般而言,城市最初是靠工业起步的,尤其是轻工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吸纳劳动力的多种特征,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会促使形成劳动力转移的第一次浪潮。地区工业化得以发展,首先要做好产业定位和产业培育,政府要适度调控,着眼于工业产业的预期产值、产业发展成本、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治理等因素的现实考虑,选择工业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规模;根据各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规划一个适度的工业产业发展模式,提高产业规模效益,防止因片面追求工业的大而全而带来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次要致力于提升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建立整体品牌优势,引导县域、乡域经济中规模优势企业加快生产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换代,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打造高科技含量企业。

其次,要促进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工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客观上导致企业对外部环境及社会服务的依赖性不断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由此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富有效率的专业分工使更多的人进入中高档消费阶层,对生活性服务的需求应运而生。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会掀起劳动力转移的第二次浪潮,因此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及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社会化水平。在城镇,对于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传统服务业,要在扩大规模、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带动优势服务业做大、做深、做强;对于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教育、社区服务、体育等现代和生活服务业,要依靠政府资助、引入社会资本、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同时把服务创新和提高服务业技术水平作为提高服务业竞争力的关键环节来抓。

产业的发展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必要前提,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具备或开始具备产业化条件,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化的进程是不均衡的,这表明农村人口的迁入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充分条件,该充分条件就是一定的市场扩张力。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构造城市快速发展的硬件平台;要坚持市场取向,拓宽城市建设

融资渠道,依靠市场运作,搞活城市经营,提升城市的市场扩张力。

产业的发展可以增强整体发展实力,市场扩张力可以扩大城市辐射力,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城市化的效应,达到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

(二)促使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政策建议

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二者的因果关系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解释变量,因此,本部分立足于收入差距因素提出推动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对策建议。迁移前后两地之间的收入差距首先体现在迁入地较高收入的边际效用,因而要提高迁入地较高收入的边际效用。

1.提高迁入地收入的边际效用

(1)合理调整农民工工资,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为保障城市的基本建设和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流动,有必要根据城市物价水平,合理调高农民工工资;加强对外来劳动人口集聚较多的建筑、服务、餐饮等行业的日常监管;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建立预警体系,对连续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给予社会公示,并尝试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当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时,政府可启动该项保证金,保证农民工能够及时、足额拿到自己的血汗钱,保证金的形成主要是用人单位依据工资额的一定比例向政府缴纳。

(2)推行农民工子女社会福利制度,保证农民工的社会权益。教育主管部门应把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覆盖到农民工子女身上,保障其基本的受教育权。2008年年初,浙江省教育厅宣布免除符合入学条件的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借读费,民工子女在城市读书和本地的孩子完全一样,建议将这种同等待遇政策适时地推广至全国各省份。除此之外,学校的学杂费减免、奖学金发放、生活费补助等照顾性政策也要更多地向农民工子女倾斜。在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医疗保险方面,有必要建立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大病或疾病住院保障机制,尝试同城市户口居民相同的医疗保障制度,逐渐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

(3)健全社会救助制度,必要时为农民工提供援助。经济层面上的社会救助制度包括:在最低生活保障上,保障的对象逐步由非农户口的城镇居民扩展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生活保障标准的所有人员;在失业救助上,明确经济补偿标准,把失业期间的失业补贴切实发放到农民工手里;在医疗救助上,考虑为农民工建立医疗保险制度和工伤保险制度。把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救助体系,纳

入城镇原有的弱势群体救助体系,多方面拓宽救助资金的来源渠道,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提高和保障农民工工资,可以通过收入差直接提高转移就业人口收入的名义效用;实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可以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角度降低生存成本,提高劳动力转移就业所得收入的实际效用。

2.降低迁入地收入的成本率

转移前后两地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在迁入地较高收入的边际效用,也体现在迁入地较高收入的成本率上,因而要降低迁入地较高收入的成本率。

(1)注重信息引导,完善信息发布渠道,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信息搜寻成本。靠“资深”外出农民工帮带的传统方式提供的就业信息量很小、可靠性差,市场化的中介组织信息价格又较高,农民工就业信息的取得成本较大,因此地方政府应不断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社会组织程度,组织专门人员和机构大力开拓劳动就业市场,广泛收集各方用工信息,确保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并以电视台、报纸媒介、村委宣传栏等途径向农民传递各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并使这项工作长期化、稳定化。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对农民工的服务力度。要建立和规范劳动力中介市场,严厉打击发布虚假信息骗取农民工钱财的非法中介组织,鼓励发展各类专业劳动力市场,但要严格控制信息价格。

(2)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自身投入成本。中央政府要划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补贴输出地政府,用以输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政府也可以采取措施激励企业办学,对创办农民工学校并积极开展培训的企业,给予教育培训补贴。在农民工输入地,要启动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系统,创办农民工学校,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技能型转变的要求;要规范农民工的劳动关系,努力实现农民工就业的稳定,只有让农民工安居乐业,针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才能够收到实效;还需建立个人激励机制,提高农民工培训、学习的积极性。各方政府共同努力,减少农民进军市场的障碍性约束,降低非农就业农民自身所需的投入。

(3)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与生命健康权,保护其劳动权益。必须坚决取消对外来人口就业的各种政策限制与地域歧视,让外来农民获得合理的工资报酬,保障外来人口的平等就业权和劳动报酬权。把转入农民的工作时间控制在正

常合理的范围内,切实保障其休息权。健全劳动保护与劳动监察、安全监管机制,确保转移农民的生命与健康权益不受损害。坚决消除农民工工资的克扣、拖欠现象,对恶意拖欠、情节严重的用人单位,可以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切实维护转移农民的劳动权益。

(4)赋予外来务工人员民主权利,让外来人员融入当地软环境,消减其心理负担成本。为避免外来农民工的受当地人歧视和排挤的阴影心理,有必要改进现行的选举制度,完善人民团体制度,赋予农民工有序参与当地政治事务的民主权利。城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妇联等组织和团体中,应当明确规定

有农民工代表,为农民工提供合适的参与当地政治事务的途径,让农民工实现有序参与当地政治决策的民主权利。消除影响外来人员与当地居民关系的潜在隔阂,城市社区应将农民工视为社区成员平等对待,各种公共服务网络应当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享,尽力消除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隔阂,减轻和消除外来人员迁入的心理负担。

以上四项措施可以降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在城镇就业的成本代价,减小非农收入的成本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达到最优状态。

参考文献:

- [1] 赵雪雁. 城市化与区域发展[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153-168.
- [2] 罗海藩. 省域城镇化战略[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65-342.
- [3] 杨雍哲,段应碧. 论城乡统筹发展与政策调整[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4-19.
- [4] 费景汉 拉尼斯. 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52-60.
- [5] 易丹辉. 数据分析与 Eviews 应用[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5.
- [6] 胡金焱,卢立香. 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因应:1986~2007[J]. 改革,2009,22(2):81-87.
- [7] 都阳,朴之水. 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J]. 中国农村观察,2003,9(5):2-9.
- [8] 刘小翠. 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协整分析[J]. 温州大学学报,2007,20(4):70-74.
- [9] 董长瑞. 农村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J]. 山东经济,2008,24(3):25-29.
- [10] 杭雷鸣. 论收入差距扩大化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效应[J]. 经济问题,2005,14(9):38-40.
- [11] 李强,蔡根女. 剩余劳动力的系统动力学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2005,33(11):2144-2145.
- [12] 杜瑞珍.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比较研究[J].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5(11):22-25.
- [13] 陈文权. 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践与借鉴[J]. 重庆行政,2008,34(1):83-86.
- [14] 胡枫.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 浙江社会科学,2007,23(1):207-211.
- [15] 贺文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原因及影响[J]. 安徽农业科学,2008,36(5):2 057-2 059.

The Cause and Effect Analysis of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Based on 29 Provinces and Cities' Empirical Data

HUANG Guo-hua

(Liberal Art College,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1995-2006 in China, the paper aims to carry out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bou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It finds that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reciprocally affect each other. Meanwhile there is a bilateral Granger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duce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we should on one hand improve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ural labor mobility, we must proceed from two aspects: increase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reduce its cost.

Key words: rural labor mobility;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cause and effect

[责任编辑:孟青]